

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基層社會建設

曹天忠

摘要

新桂系時期廣西地位舉足輕重。本文在追蹤相關學術史前提下，認為忽略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四大建設關係的研究，既不符合原來廣西建設「整體性」和「連鎖性」特徵的歷史實際，也無助於已有相關研究成果的進一步深化和展拓。本文試圖採用歷史學方法，運用大量原典資料，發現並重建 20 世紀 30-40 年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基層社會建設關係的歷史。首先探討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建設的理論和法律依據，廣西建設「整體性」和「連鎖性」特徵；其次，在實踐層面上，具體而微地論證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基層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四大建設的整體和各個部分的內在關係；最後，探討其得失。揭示國民基礎教育在廣西社會建設中的媒介和促進功能。

關鍵詞：國民基礎教育、廣西、社會、建設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and The Basic Social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Province

Cao Tianzhong

Abstract

The position of the so-called New-Guangxi Faction was very important in Guangxi province in the 30's and 40's of the 20th century. By following along the history of relevant academic study of the four major areas of concern in the province, i.e., politics, economy, the military and cultures,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still regards it as insufficient, because it has neglected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in these four major areas. Holding that such neglect does not fit the original overall and inter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nor helps to deepen and broaden the available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by means of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rich original resources, tries to restore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and the basic social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in the 30's and 40's of the 20th century. First it makes an inquiry into the theoretical and legislative evidences on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and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an examination of the overall and inter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province. Secondly it make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inner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in the above-mentioned areas, both as a whole and separately. And finally an inquiry is made to analyze their merits and demerits.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reveal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playing the role of both a medium and promotier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uangxi.

Key Words: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Guangxi Province, Society,
Construction

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基層社會建設

曹天忠*

前言

一、理論

二、整體關係

三、教育與政治

四、教育與經濟

五、教育與文化、軍事

結論

前言

新桂系時期廣西在民國政壇上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引起海內外學者濃厚興趣，研究成績不菲。主要反映在通史式的廣西社會建設史研究，以及專題性的雷沛鴻(1888-1967)教育思想、尤其是國民基礎教育史的研究上。¹這

* 作者（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為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講師。遙謝數位匿名審稿先生的不吝賜教，這對完善拙作，減少失誤，以及本人精進，均有鞭策作用。

¹ 綜合著作有：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鍾文典主編，《20世紀30年代的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Eugene W. Levich, *The Kwangsi Way in Kuomintang China, 1931-1939*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朱泮源，《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1860-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朱先生在上書第488頁，已注意到國民基礎教育與當年廣西「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面均密切互動」。國民基礎教育研究主要有：韋善美、程剛，《雷沛鴻教育思想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年），章4；雷堅，《雷沛鴻傳》（南寧：廣西

些成果，為進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礎。但從更高要求看，將原本綜合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建設「條塊分割」式的研究，及對國民基礎教育就事論事的探索，大有可商榷之處。特別是將作為廣西「模範省」建設的動力和代表性成果之一的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建設史分隔研究，既有違廣西建設「整個性」和「連鎖性」特徵的歷史實際，也不利於廣西建設史已有研究的深化和雷沛鴻教育思想研究的拓展。敏銳的學者已注意到這一點，朱滋源先生的〈救亡兼啓蒙的良方：雷沛鴻訓政式普及教育改革思想〉一文，從訓政新視角，把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社會聯繫起來考究，予人啓迪。本文擬進一步將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基層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建設結合考察，試圖在時賢基礎上，有所區別和創獲。方法上，根據歷史學方法，利用自己生長於廣西的有利條件，除雷沛鴻本人言論外，搜集大量相關的文書、檔案、報刊、遊記、考察報告、回憶錄、文集等原典資料，將教育與廣西建設關係的歷史過程和關鍵細節，盡可能重建在紮實可靠的基礎上。時間跨度起自 1933 年，止於 1940 年。²研究重點，不在理論，而在實踐；不在上層，而在基層；在教育與社會互動關係上，關注的主要不是廣西社會對教育的制約，而是教育對廣西基層社會建設的作用。

人民出版社，1997 年），章 5；郭道明主編，《雷沛鴻國民教育概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相關論文有楊啓秋，〈三十年代廣西的國民基礎教育運動〉，廣西雷沛鴻教育思想研究會編，《雷沛鴻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2 年），冊一，頁 254-269；朱滋源，〈救亡兼啓蒙的良方：雷沛鴻訓政式普及教育改革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9（1998 年 6 月），頁 135-177。

2 1933-1936 年為雷沛鴻第 3 次任廣西教育廳長時間，但他手訂的《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六年計劃大綱》（1933-1940）經省政府常會修正通過，有法律效力，1936 年繼任廳長丘昌渭仍按「計劃施行」，直到 1940 年。雷沛鴻，字賓南，筆名魯儒，廣西南寧市郊津頭邨人。同盟會員，歐柏林大學文學士，哈佛大學文科碩士，四任廣西教育廳長，一度任廣西省立醫學院院長、廣西大學校長。係中央大學、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浙江大學、中山大學教授。20 世紀 20 年代，主張黨化教育，40 年代強調自由通才教育。一生主要事功是 30-40 年代為中興民族，促進社會變革，立足廣西，大刀闊斧地對中國傳統教育作全面改造，推行普及國民基礎教育運動，創制國民中學，籌設國民大學（西江學院），建構中華民族教育體系。其中，以國民基礎教育最具聲勢，為近代中國著名教育家。

一、理論

(一) 雷沛鴻之教育改造與社會改造的關係

雷沛鴻認為，教育改造與社會改造的關係，一方面是互動、工具和目的的關係。教育改造運動，即革新教育，「用之以為改造社會的工具」；同時社會改造運動，即建設新秩序和新社會，「用之以為改造教育的根據」。二者「互相推動」。³另一方面，是作用和反作用關係，或說是制約與反制約關係。雷沛鴻講解國民基礎教育立法精神時的結論是，教育與社會改造關係，「自教育言之，所以改造教育的制度和內容，使與建設中的新社會秩序相適應；自社會言之，所以完成新社會秩序，使社會的組織因教育的啓導而奠立基礎」。⁴又說，「在革命進程中，教育與社會的革新的關係，應表現為教育改造運動與社會改造運動的配合施工，而前者統一於後者，並以之為前提條件」。⁵對國民基礎教育改造運動與社會改造運動這一「雙改造」關係，方與嚴進一步將之發揮為「雙建設」關係：「國民基礎教育，對教育本身來說，是一種教育改造運動，同時是一種教育建設運動。對社會立場說，是一種社會改造運動，同時是一種社會建設運動。」⁶1934年5月，雷沛鴻在〈新教育與新秩序〉講演中，將國民基礎教育與新社會秩序的建設，具體析成新教育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四層關係。⁷

(二) 廣西教育與社會改造之法律依據

雷沛鴻認為，教育改造和社會改造的理論付諸實施，纔能變成現實；

³ 雷沛鴻，〈國民基礎教育法案的立法精神〉，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下冊（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44。

⁴ 雷沛鴻，〈國民基礎教育第二講補遺〉，《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日刊》（以下簡稱《日刊》），號44（民國24年3月16日），頁2。

⁵ 雷沛鴻，〈《國民中學教育叢書》序〉，《國民中學教育論叢》（南寧：圖書供應社，民國37年），輯1。

⁶ 《南寧民國日報》，民國24年10月10日(17)。

⁷ 雷沛鴻，〈新教育與新秩序〉，《雷沛鴻文集》，下冊，頁49。

而能否成爲現實，科學方法至關重要。科學方法，在教育改造上說，是「教育策劃(education planning)」，表現在國民基礎教育運動上，是《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六年計劃大綱》；在社會改造上，則爲「社會策劃(social planning)」；反映在廣西社會改造運動上，則爲《廣西建設綱領》。雷沛鴻很欣賞社會策劃，認爲其好處，「在先有計劃，開始工作後便計日程功，絕不因人的關係而加以輕重」；甚至認爲這是「民族國家最重要的事業」。⁸因此，研究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社會改造關係，必須梳理《六年計劃大綱》與《廣西建設綱領》的關係。

1934年3月，爲使廣西各項建設有計劃進行，廣西省黨、政、軍聯席會議通過《廣西建設綱領》，規定了廣西建設的總方針。次年8月修正。該綱領以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爲政治基礎，以「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相標榜，號稱廣西的「根本大法」。其第三條規定，「以現行民團制度，組織民衆，訓練民衆，養成人民自衛、自治、自給能力，以樹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礎」。亦即本於「地方自治」原則的自衛、自治、自給「三自」政策，實乃廣西建設的總原則。以政治建設、經濟建設、軍事建設和文化建設，即通稱的廣西「四大建設」爲內容。⁹其中文化建設規定，「實施適應政治、經濟、軍事需要的教育」，¹⁰根據政治、經濟、軍事需要，確定教育方針。省主席黃旭初強調，國民基礎教育「教科書教材，要參加建設綱領，以及本省政令」。¹¹從根本上規定了《廣西建設綱領》對國民基礎教育的制約。

廣西四大建設的顯著特徵之一，即連鎖性。雷沛鴻說，廣西建設是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四大建設及其「連鎖」。¹²黃旭初對廣西四大建設的

⁸ 雷沛鴻，〈方法論發凡〉，《雷沛鴻文集》，下冊，頁62-63。

⁹ 李宗仁述、唐德剛撰，《李宗仁回憶錄》，下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471-472。

¹⁰ 鍾文典主編，《20世紀30年代的廣西》，頁23。

¹¹ 黃旭初，《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建設》（廣西省政府編譯委員會，民國29年），頁108。

¹² 雷沛鴻編述，《本省教育方針講演綱要》之五，《廣西青年軍幹部講習班講義》（未注出版時間），頁13。

連鎖性論述最詳。認為，政治建設與軍事建設是「保障」關係；經濟建設為保證政治建設秩序的物質基礎；文化建設可為政治建設提供動力「源泉」；¹³軍事建設為經濟建設提供保護；政治建設對外反對列強侵略，對內「肅清封建餘孽」，防止對「農民壓迫剝削」；文化建設可教農民識字，「灌輸以農業、手工業各種改良的技術」，提供智力幫助，尤其是「提高民族意識的精神教育」。¹⁴廣西「四大」建設的連鎖性特徵，說明四種建設是整體、齊頭並進、緊密聯繫、互相循環、共同推進、不可偏廢的。

在四大建設系統的、連續的關係中，教育扮演了媒介、推進工具的角色。黃旭初說，教育雖然是建設綱領的一部分，但這一部分「做得是好是壞，就可以影響其他政治、經濟、軍事各部門以至整個的建設。教育工作做得好，對於整個建設就有顯著的推進，尤其在鄉，這種現象更容易看得出。」¹⁵

從廣西省政府施政計劃看，《廣西建設綱領》是廣西建設的總體方針。為保證建設綱領化作具體施政措施，省政府歷年都制定實施計劃。不僅把教育計劃包括進去，而且明確要求，國民基礎教育要圍繞年度工作重點進行，並要求各方積極配合。省政府 1935 年年度工作實施重點，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¹⁶於是當年度文化建設中的國民基礎教育計劃，就有五條規定。其中第二、三、四條均與經濟建設相關。如第三條規定，「各級基礎學校，在本年度應試行自營園藝或牧養牲畜」；第四條規定，「擴大生產教育計劃，使編有成人班之各級基礎學校，與縣農場工藝廠發生密切聯繫」。¹⁷雷沛鴻也承認，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替本省服務，……本年事業中心側重在生產教育，完全是根據本省政府所昭示的。」¹⁸可見，從《廣西建設綱

¹³ 亢真化編，《黃旭初先生之廣西建設論》（南寧：建設書店，民國 27 年 9 月），頁 22-23。

¹⁴ 亢真化編，《黃旭初先生之廣西建設論》，頁 24-26。

¹⁵ 黃旭初，《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建設》，頁 22。

¹⁶ 〈二十四年度廣西省施政計劃綱要〉，李宗仁等著，《廣西之建設》（桂林：建設書店，民國 28 年 10 月 10 日），合訂本，頁 603。

¹⁷ 〈二十四年度廣西省施政計劃綱要〉，李宗仁等著，《廣西之建設》，頁 610。

¹⁸ 雷沛鴻，〈本院廿四年度工作進行計劃總綱說明〉，《日刊》，號 225（民國 24 年 9 月 2 日）。

領》，或說從政治角度看，廣西四大建設與國民基礎教育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從《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六年計劃大綱》，即從教育角度看，國民基礎教育與四大建設之間，也密切相關。國民基礎教育的主旨規定：「以政治力量為主，經濟的力量及社會的力量為輔，限於六年之內普及全省國民基礎教育」；「以國民基礎教育的力量，助成本省下列各項建設：1.政治建設；2.經濟建設；3.文化建設；4.社會建設」。¹⁹政治力量是國民基礎教育實施的重要推動力；而國民基礎教育，則為廣西四大建設提供助力。廣西一切教育設施原則，要適應現階段政治、經濟、軍事需要，以共同完成整個廣西的建設工作。國民基礎教育的設施方針，要為切合「三自」政策的要求而實施。依雷沛鴻的看法，國民基礎教育，「必須與民團訓練，國民義務兵役制同時推進，以增厚民族自衛之力量」；「必須與邨街鄉鎮自治事業互相提攜，以培植人民自治之能力」；「必須力求勞動化及生產化，以鞏固民族自給之經濟基礎」。²⁰國民基礎教育這三個「必須」，表明它不僅與廣西建設的綱領相關，而且與廣西建設中的基層四大建設存有密切關係。這是一種互動、反作用的積極關係。

二、整體關係

廣西國民基礎教育設校規定，基礎學校以每邨（街）一所，中心國民基礎學校以鄉（鎮）一所為原則；就實施程式而言，由鄉邨而城市。即國民基礎教育的重心，不在城市而在鄉邨基層社會。故可說，國民基礎教育實際上是一種基層教育。所以，李宗仁曾有「新政策下的廣西，基層的國民教育是義務性」之說。²¹國民基礎教育的基層性，表明它與廣西基層社會息息相關。

¹⁹ 雷沛鴻，〈六年來廣西國民基礎教育〉，《雷沛鴻文集》，下冊，頁 250-251。

²⁰ 雷沛鴻編述，《本省教育方針講演綱要》，頁 14。

²¹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頁 473。

廣西「一向注重基層建設」。²²在廣西基層各種建設中，尤以軍事建設中的民團訓練和文化建設中的國民基礎教育最為著名，二者並稱為廣西的「兩種特殊建設」。²³馬君武(1882-1939)甚至認為，廣西號稱「模範省」，其實值得稱道的乃實施民團和國民基礎教育而已。²⁴論者一般多以為，廣西國民基礎教育建設成績卓著。其實，重要的不是國民基礎教育本身的成績，而是它的社會功能，積極參與廣西基層社會四大建設所起的作用。由於廣西基層建設具有整體性和連鎖性特徵，因此，國民基礎教育所參與的廣西基層建設，可從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四大建設的整體關係，及國民基礎教育與四大建設的各個關係兩方面考論。

(一) 國民基礎教育在整體四大建設中的功能

國民基礎教育能夠參與四大建設的整體工作，是因為在政府方面，已有四大建設整體性和連鎖性的政策規定。就教育方面而言，雷沛鴻也從生活即教育，「生活具有整體性，所以教育亦必須具有整體性」的原理中，找到了根據，並給予呼應。生活有整體性，教育祇是生活的一種方法和一種技術。因此，教育所有內容，「當完全包含於生活中，尤其是包含於民族生活中之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²⁵可見，從教育方面看，國民基礎教育參與廣西基層整體四大建設，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

國民基礎教育至少有下列功能：首先，基礎功能。黃旭初說，國民基礎教育「就是建國的奠基工作」；²⁶又說，廣西政治一貫的政策，是「要本省種種建設辦理得完善，國民基礎教育是先要完成，以為政治、軍事、經濟

²² 梁上燕，《廣西建設》（廣西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民國31年3月20日），頁41。

²³ 龔家瑋，〈《廣西新教育之觀感》編者弁言〉，龔家瑋主編，《廣西新教育之觀感》（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印刷，民國25年6月）。

²⁴ 《日刊》，號114（民國24年5月27日）。馬君武不止一次這樣說。據謝國楨，《兩粵紀遊》云，1935年8月，馬君武在梧州講演，對於廣西建設的看法主要有二，「一為辦理民團，二為強迫教育」。謝國楨，《瓜蒂庵文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291。

²⁵ 雷沛鴻，〈整個教育體系的演進〉，《雷沛鴻文集》，下冊，頁188。

²⁶ 黃旭初，《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建設》，頁40。

建設的基礎」。其次，推進功能。用當時旅桂教育家童潤之（生卒年不詳）的話來說，「任何建設事業，尤其是基層建設，如果沒有教育的助力，就無法推進。辦合作需要合作教育，辦保甲需要保甲訓練；他如地方自治，農業推廣，民團訓練，風俗改良等，亦必須用合理的教育方法，或充實民衆的教育基礎，纔有成就的希望」。²⁷再次，彌補軍政令不足的功能。雷沛鴻認為，廣西基層建設自上而下，依靠軍政機關的施發命令，固然有相當作用，但這種靠強制服從的辦法，久而久之，會令民衆產生抵觸，至少不是唯一的辦法。因此，必須輔以國民基礎教育的力量，使人民知道建設成敗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從而自動地、積極地參加建設，以「補助政令軍令之不足。」²⁸最後，提供精神服務。黃旭初在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成立二週年紀念會上作訓詞，說到廣西在復興中華民族過程中的重要工作：「第一是國民基礎教育，第二是學校中的學生軍訓，第三是民團，在三者之中，國民基礎（教育）尤為重要」。因為一個民族能否復興，就看它的精神教育如何，它的心理建設的工作如何；而國民基礎教育，是「一種精神教育」。民族意識的提高，民族心理的建設，是它「應該負擔的工作」。²⁹

正因為國民基礎教育有諸多功能，故廣西省政府對國民基礎教育參與綜合四大建設工作給予充分重視。1936年2月，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召開成立兩週年紀念大會時，白崇禧(1893-1966)、黃旭初及各軍軍長均出席。大會標語寫著：「普及國民基礎教育是實施廣西建設綱領的主要方法」，「普及國民基礎教育是復興中國的前驅工作」。³⁰廣西省政府為精簡機構，僅設教育、民政、財政、建設四廳，在辦理國民基礎教育過程中，「教育廳是主動的，民政廳是參酌的，財政廳是被動的。」三個機關職能不同，

²⁷ 童潤之，〈對廣西教育的一個建議〉，《建設研究》，卷1期4，頁5。

²⁸ 雷沛鴻，〈三位一體制的運用問題〉，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續編（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88。

²⁹ 〈省府黃主席訓詞〉，《國民基礎教育叢訊》，號14（民國25年2月26日），頁29-30。

³⁰ 〈本院成立二週年紀念大會標語〉，《國民基礎教育叢訊》，號14（民國25年2月26日），頁首。

但都「合作努力」，推動國民基礎教育。³¹民政廳長雷殷（字渭南）一次出巡後說，「我認爲國民基礎教育運動，普及教育是目前很重要而亟須設法推動的事業。我這次出去視察，費了四個月的時間，到有二十餘縣，每天平均有三小時談話，其中有一小時的時間談的是國民基礎普及教育」。³²基於對國民基礎教育在四大建設中作用的共識，廣西軍政當局普遍重視，團結協作。這是國民基礎教育進展迅速並在建設中充分發揮其功能的重要原因。

（二）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基層「三位一體」的組織形式

1934年起，廣西鄉邨行政組織以「三位一體」制度，組織實施基層四大建設。「三位一體」含義有三：一指「一人兼三長」：鄉邨長兼民團後備隊長、國民基礎學校校長，權責因此得到集中；二指「一所三用」：鄉邨公所、民團後備隊隊部、國民基礎學校校舍三個場所合一使用，節省費用；三指在事務上使基層四大建設連成一氣，「打成一片」，力謀均衡發展。³³學術界從政治角度對此有不少論述。³⁴這裏著重從文化角度論述國民基礎教育與「三位一體」的關係。雷沛鴻對此作出了貢獻。

廣西基層社會組織實施「三位一體」的原因，一般看法是由於人才奇缺和爲節省開支，雷沛鴻則認爲主要由中國、特別是廣西社會分工不發達的環境決定。他認爲，與西方分工發達的產業社會有很大不同，中國仍處於農業社會、鄉邨社會、宗法社會，亦即社會不發展、分工不發達的前現代社會。在這種社會基礎上產生出來的教育制度，如國民基礎教育制度，其設施「要綜合，要簡單，要有效，並且使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打成一片」。雷沛鴻從廣西基層社會發展內部構造中，尋找「三位一體」制度的起因，較之從政治、經濟上尋找，更爲深刻。這是雷沛鴻對廣西「三位一體」組織制度闡

³¹ 徐旭，〈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的前程〉，《中華教育界》，卷22期1（民國23年7月），頁128。

³² 〈雷民政廳長渭南先生在本院第三次全體大會講話〉，《日刊》，號232、233、234合刊（民國24年9月23-25日），頁3。

³³ 梁上燕，《廣西建設》，頁42。

³⁴ 參見鍾文典主編，《20世紀30年代的廣西》，頁77-78。

述的一個貢獻。基於此，他進一步將「三位一體」發展為「四位一體」。1935年3月，雷沛鴻發現，在「三位一體」運行過程中，祇有政治、軍事和教育，而沒有經濟，結果使前三種事業「難以為繼」。因而重新決定最低限度的基層經濟建設，如造林、邨倉、合作社、公耕等，都側重於公共造產。於是，「三位一體」應改稱「四位一體」，務將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打成一片。³⁵這一發展的意義，在於使廣西基層社會四大建設的實施，有了相對應的基層組織依託，也不妨說是雷沛鴻對廣西省政府不太重視經濟建設傾向的一種糾正。³⁶這是雷沛鴻對「三位一體」制的又一貢獻。

雷沛鴻自覺地把基層四大建設與「四位一體」相互配合，並適應「三自」政策需要：

基礎學校校長兼邨街長和民團後備隊隊長；學校同為邨街公所及民團後備隊隊部，一方面是政教合一，另一方面是文武合一，再一方面是管教養衛打成一片，校長兼後備隊隊長，以國民基礎教育協助民團的訓練，又以明恥教戰為國民基礎教育實施方針之一，這是適應自衛的需要；校長兼邨街長，教職員學生輔導邨街民大會推行政令，又普及教育，掃除文盲，以促進地方自治，這是適應自治的需要；提倡生產教育配合基層經濟建設，透過邨街公所辦理邨街造產、合作事業及其它經濟設施，這是適應自給的需要。³⁷

這既表明三位一體組織形式應「三自」政策需要產生，又反映三者之間互相促進關係。

國民基礎學校在「三位一體」中的運用。「三位一體」制度在實際運作中之優點，是通過以國民基礎學校為紐帶，將四大建設聯繫起來，分工合作，最大限度地發揮它的整體優勢功能。「三位一體」在實際運作中的情況，

³⁵ 雷沛鴻，〈國民基礎教育的產生〉，《雷沛鴻文集》，下冊，頁234。

³⁶ Diana Lary 在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一書中對廣西重政治、軍事，輕經濟頗有指責。轉引朱滋源，〈評《國民黨統治下的廣西模式，一九三一～一九三九》〉，《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輯21（台灣：國史館，民國87年12月），頁233。

³⁷ 雷沛鴻，〈廣西建設與國民基礎教育〉，《雷沛鴻文集》，下冊，頁286。

當時在廣西考察的胡政之有過較具體的描述。從武鳴到靈水及起鳳山途中，胡先生看到：

邨公所多設在廢廟或祠堂之內，同時即為國民小學，房屋雖不佳，內容卻整潔，一邨的人戶多寡，交通地形，以及學齡兒童的調查，都有圖表懸掛在外，令人一目了然。公所多有民衆開會場所，兩旁有公衆苗圃園林，佈置得井井有條。邨長態度亦好，見梁指揮官³⁸之親熱，宛若家人父子，令人旁觀，羨慕讚歎，益信訓練教育之有萬能功用。³⁹

黃旭初曾稱胡政之(1889-1949)所作關於廣西的記載，「客觀而深刻，坦率而中肯。」⁴⁰故其所言廣西「三位一體」制度具體設施和教育在其中的多種作用，有一定參考價值。

在「三位一體」制下，國民基礎學校的功能不再是一般單純意義的學校，而是一種兼有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四大建設複合功能的基層組織。國民基礎學校在「三位一體」制度中具有中心和靈魂地位。它不僅是幼稚、兒童、婦女和壯丁各種教育的中心，而且也是「鄉邨自治的中心、公共造產的中心、文化活動的中心和民團訓練的中心」；⁴¹或者說，舉凡農邨組織，地方自治和農邨合作運動，民團訓練等等工作，都要以廣西各邨 2 萬多個國民基礎學校為發動的機關。所以，國民基礎學校是「各邨的靈魂，合各邨的靈魂便成為廣西全省的靈魂。」⁴²有人甚至認為，國民基礎學校是廣西「整個農邨，全民生活，集團力量、民族意識的培養所和策源地，藉以使全邨民衆，自謀其全邨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建設」，因而是「復興中華民族之最下層基礎」。⁴³這對國民基礎學校作用的估計，或有所誇大，但較準確地

³⁸ 即梁瀚嵩，廣西民團創始者之一，時任南寧區民團指揮官，正陪同胡氏考察。

³⁹ 冷觀（即胡政之），〈粵桂寫影〉，《廣西印象記》（無出版者，民國 24 年 3 月），頁 19。

⁴⁰ 曹聚仁著、曹雷編，《聽濤室人物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99。

⁴¹ 雷沛鴻，〈辦理國民基礎教育的三個要素〉，《雷沛鴻文集》，下冊，頁 177。

⁴² 雷沛鴻，〈中國過去的普及教育運動〉，《日刊》，號 36（民國 24 年 3 月 8 日）。

⁴³ 徐旭，〈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的前程〉，《中華教育界》，卷 22 期 2（民國 23 年 8

把握了國民基礎學校的多功能特性。

「三位一體」的最大作用，在於使廣西四大建設連成一片之政策，在組織制度上有了保證。雷沛鴻認為，「三位一體」這一基層組織的精神，「在於聯繫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四大建設的工作，使彼此通力合作，不致使各部門的工作隔離開來，互不相通，甚至變成各有天地，不相聯繫。基層組織的最大作用，是要把四大建設縱橫聯繫，互相幫助，分工合作，以進行綜合的建設。」而在四大建設各部門的聯繫中，又「以國民基礎教育為主要的聯繫」。⁴⁴在國民基礎教育的穿針引線下，「三位一體」使四大建設間的聯繫整合起來，發揮最大功能。這與現代系統論中整體大於它的各個部分功能之和的思想相通。

「三位一體」的另一個優點，是使四大建設揚長避短，取長補短，優化組合，互相促進，收到較理想的行政效益。這一點，「三位一體」制問題專家亢真化看得十分清楚：

三位一體制下的國民基礎學校，它的效用就不止是教好幾十個小學生，而是鄉邨長可以利用基礎學校做推行政令的工具，如宣傳政令，傳佈新聞，並發動學生參加實際建設工作，使理論與實踐打成一片，教學做完全合一，教育的效率也增加了。此外，如鄉邨長在推行強迫教育的時候，一方面運用鄉邨公所的行政力量來督促民衆，一方面又可運用民團組織，實施有組織的教育；在推行政令時，鄉邨長可以用教育的力量，啓發民衆參加工作的熱忱，亦可由民團的集體力量推動建設；在辦理民團時，鄉邨長可以用行政力量促進民團的編組，一面又用教育的力量，使民衆瞭解民團編組訓練的意義。這種事業的互為運用，祇有在三位一體制下，纔能具有靈活的效能。⁴⁵這種如黃旭初所說的「以教育力量促進行政效率」、「以行政力量補助教育」、

月），頁 129。

⁴⁴ 雷沛鴻，〈三位一體制的運用問題〉，《雷沛鴻文集》，續編，頁 87-88。

⁴⁵ 亢真化，〈廣西鄉邨之三位一體制之檢討〉，《廣西之建設》（一），頁 339-340。

「以政教力量發展民衆力量」的組織內互相發展，⁴⁶良性循環的優點，提高了行政效率，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廣西社會經濟落後的不足。早在 1934 年，廣西當局就認定，「三位一體制度爲實現廣西建設綱領最有效之政策，證諸一年來各縣施行之實況，已可概見。」⁴⁷這種制度受到普遍好評。雲南教育廳長龔仲鈞（生卒年不詳）考察廣西後說，「貴省將行政、教育、經濟、軍事合爲一爐，爲最良善之辦法，若得其人爲理，一切庶政，即不難迎刃而解，中國復興，實於貴省基之矣。」⁴⁸因此，後來國民政府爲抗戰需要，實施新縣制，采借廣西「三位一體」制做法，決非偶然。

（三）國民基礎教育參與基層整體四大建設之方式

國民基礎教育主要以如下方式，參與廣西基層整體四大建設。

1. 訓練學生

國民基礎教育以廣西全體民衆爲教育對象。民衆經過教育訓練，纔有能力參加建設。1935 年 1 月，雷沛鴻認爲，「舉凡一種建設，都不能離開民衆，無論軍事建設也好，政治建設也好，都是先要使民衆有充分的瞭解，然後纔能夠熱烈地贊助、參加和擁護」。⁴⁹有人說，廣西建設的主要動力是民衆：廣西是「以通過教育的力量去發動民衆從事建設……在廣西建設進程中，國民基礎教育，是盡了協助建設的功能。」⁵⁰

2. 倚重教師

國民基礎教育的校長和教師負有多重使命：「民團後備隊是他負責去訓練，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是他負責去辦理，農林是他負責去開發，鄉邨裏

⁴⁶ 黃旭初，《縣政建設與基層建設》，頁 362。

⁴⁷ 廣西省政府編輯室編，《二十三年度廣西省政府施政記錄·教育》（南寧：廣西省政府印行，民國 25 年 6 月 20 日），頁 650。

⁴⁸ 《南寧民國日報》，民國 23 年 4 月 19 日。

⁴⁹ 雷沛鴻，〈國民基礎教育與軍事政治建設的關係〉，《日刊》，號 8（民國 24 年 1 月 27 日），頁 3。

⁵⁰ 梁上燕，《廣西建設》，頁 46。

發生大大小小的糾紛事件，是他負責去處理，兒童成人的不識字，是他負責去灌輸，整個的社會國家，都要他負一個大部分的責任去建設」。⁵¹

3. 民眾教育職能

1934年5月，雷沛鴻在〈國民基礎教育法案的立法精神〉講詞中認為，國民基礎教育在民眾教育方面，要「協助民團訓練，使之健全；改組鄉鄰組織，使之嚴密；提倡合作事業，使之成立」。⁵²這三者，顯然是基層綜合建設中的軍事建設、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的應有之義。具體而言，「如修築道路，調解糾紛，挖塘植桐，宣傳禁煙禁賭，編練民團後備隊等，不但成人班學生需要參加，即高級班年長之兒童及教職員，亦均有協同宣傳之義務」。⁵³

4. 從一所表證中心國民基礎學校組織大綱看

廣西邕寧縣表證中心國民基礎學校組織大綱第二章第六條規定該校的「事業範圍」為：「協助民團訓練並實施民團補習教育，特注重三自三寓政策之推行」；「協助地方自治」；「改良社會環境，提倡正當娛樂，講究公共衛生，改良民情風俗等」；「舉辦各種合作事業」；「開闢小農場，種植經濟作物以供學生實習並求改良而推廣之」；「設立畜牧場以求改良家畜」。⁵⁴上述各項事業中，民團軍事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各占一項；經濟建設則占三項。邕寧縣表證中心校參與廣西基層建設的內容，較為詳實具體，體現了國民基礎教育參與廣西基層整體四大建設的精神。

⁵¹ 楊習仁，〈國民基礎學校教師應備的條件〉，《日刊》，號159（民國24年7月11日），頁4。引文中「他」原作「它」，今已改正。

⁵² 雷沛鴻，〈國民基礎教育法案的立法精神〉，《雷沛鴻文集》，下冊，頁39。

⁵³ 《民國二十四年度廣西省教育調查統計總報告》（廣西教育廳編印，民27年1月），頁179。

⁵⁴ 廣西省邕寧縣表證中心國民基礎學校編輯股編，《廣西省邕寧縣表證中心國民基礎學校校刊》（南寧：大成印書館，民國25年3月），頁10。表證中心國民基礎學校是1935年8月，雷沛鴻為了辦理國民基礎教育作示範，特在交通便利和偏僻落後縣份而設，全省共設24所。

5.從省主席言論看

30年代，在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大政治巨頭中，黃旭初掌內政，最重視教育，尤其關注國民基礎教育與整個廣西建設的關係。他認為，國民基礎教育，教人「成一個國民」，進行「愛國教育」和「生產教育」，教成人去「認識本省的政策」和推行廣西的政令，參與四大建設。⁵⁵從而使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四大建設的子系統和大系統的關係，更加明晰、具體和細密。

由此可見，廣西基層四大建設之間，為合作與分工關係，因此，在討論國民基礎教育與四大建設的綜合關係後，還必須分別探究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四大建設中之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軍事建設的具體和個別關係。

三、教育與政治

（一）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民團的政治功能

民團與國民基礎教育分別為廣西建設提供組織動力和智力動力，二者關係十分緊密。1935年8月，上海新聞報特派記者陸詒考察廣西後認為，廣西建設進步的因素，「大部分還是靠厲行民團政策和國民普及教育這兩項原動力來推進的」。⁵⁶但隨著民團組織的演變，它的軍事功能退居其次，政治功能日益重要。⁵⁷1934年9月，陳禮江（生卒年不詳）說，廣西民團是「依照地方自治的編制，從軍事訓練出發，將民衆組織起來，使人民能自衛，自給，自治的一種設施」。⁵⁸甚至有人說，民團「政治意味為十之七，而軍事

⁵⁵ 黃旭初，《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建設》，頁2-5。

⁵⁶ 《上海新聞報》，民國24年8月15日。

⁵⁷ 創設於1930年的廣西民團，其功能並非僅僅為軍事的，而是集「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四位元一體的組織」。白崇禧，《軍訓與民團》（桂林全面戰週刊社，1930年），頁14。

⁵⁸ 陳禮江，〈廣西的民團及其評價〉，《申報月刊》，卷3號9（民國23年9月），頁

作用祇十之三」。⁵⁹因此，研究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基層政治建設關係，不能忽略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民團之政治建設功能關係。

正式提出利用民團力量辦國民基礎教育者為白崇禧。1933 年底，白崇禧鑒於國際形勢險惡，覺得原來採用曉莊、定縣、鄒平式的，由學者組織民間力量辦學的「放任」政策，效果太慢，無法適應時勢需求，向剛剛第三次出任廣西教育廳長的雷沛鴻建議，利用民團力量，推動國民基礎教育。雷沛鴻表示同意。⁶⁰此後，雷沛鴻十分重視研究民團與國民基礎教育的關係。負責學術研究的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曾就「如何運用民團組織推動國民基礎教育」問題，展開熱烈研討。⁶¹其代表性成果之一，即為「廣西民團與國民基礎教育聯繫問題的研究」。⁶²

廣西民團同時具有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四位一體的性質和功能。因此，國民基礎教育與民團的關聯，其實就是其中教育與政治的交叉或公共關係。

從組織關係看，它們都依託於「三位一體」的基層組織。從「一所三用」上看，民團組織「以邨的組織為基本單位」，而國民基礎教育「也以邨的學校為國民基礎學校」，⁶³二者都立足於鄉邨級組織。從「一人三長」上看，基礎學校校長即鄉邨邨長，「二長」合一，使國民基礎教育與基層政治在人事上緊扣起來，工作上互相推動，相得益彰，促進政治建設。

從訓練民衆看，成人教育就是民團教育。國民基礎教育由兒童教育和成人教育兩部分組成。《縣政須知》載：「凡成年人日間去做工的，則夜間去邨內小學補習讀書，叫做成人教育。因訓練民團，夜間須補習讀書，上課，

42。

⁵⁹ 《廣西印象記》，輯 1，頁 17。

⁶⁰ 轉引自漕濃，〈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面面觀〉，《教育雜誌》，卷 25 號 11，頁 28。

⁶¹ 〈七月廿八日本院升旗禮記〉，《日刊》，號 175（民國 24 年 7 月 28 日），頁 3。

⁶² 雷沛鴻，〈三年間廣西國民基礎教育運動的回顧與前瞻〉，《教育雜誌》，卷 26 號 9（民國 25 年 9 月 10 日），頁 3。

⁶³ 匡時，〈民團政策與國民基礎教育〉，《民團期刊》，期 1（民國 23 年 6 月 10 日），頁 9。

又叫民團教育……民團教育的目的，在教我們能自衛，能謀生，能做公共事業，能大家合力救國」。⁶⁴20世紀30年代，日寇侵華，民族矛盾逐漸上升，救國就是最大的政治。所以，成人教育即民團教育，也就是政治教育。

民團幹部學校與國民基礎學校的師資培養和課程資源使用密不可分。廣西民團幹部學校成立於1935年，它是將原全省八區民團幹部學校取消合併而成，「以養成國民基礎學校師資及能任鄉邨街長民團幹部為宗旨」。⁶⁵該校合格的畢業生，為國民基礎學校優先選用；⁶⁶而且它所使用的普通學科課本，即為國民基礎學校的參考資料。據1934年《廣西省政府施政紀錄》載：「本省為求幹部學校之普通學科課本切合實用，兼作各級基礎學校職教員之參考資料計，特自行編輯印發各項課本……計有下列八種：一、國民基礎學校實施法；二、愛國教育實施法；三、生產教育實施法；四、國民基礎教育概論；五、各科指導法；六、合作組織；七、農業技術；八、國文講義。」⁶⁷來桂參觀的晏陽初(1890-1990)也說，「基礎教育研究院所得的材料，即由民團學校打到民團裏。」⁶⁸課本或參考資料的共同使用，也是民團與國民基礎教育相聯繫的方式之一。

國民基礎教育內容和民團目標互相配合。國民基礎教育的內容，是愛國教育與生產教育；民團的目標，是自衛、自治、自給三大政策。愛國教育與自衛政策相同，自給政策與生產教育一致。1935年黃超凡（生卒年不詳）在一篇題為〈廣西民團與國民基礎教育〉的文章中，還提出一新觀點，認為國民基礎教育除愛國教育和生產教育兩內容外，還有一內容，叫「自治教育」，並將它與自治政策相發明。作者先據雷沛鴻在〈國民基礎教育第一講〉中的一段話，證明自治教育之存在；然後又引第四集團軍政治訓練處處長潘宜之(?-1944)的觀點，強調自治教育對自治政策之推動作用：「我國現在的

⁶⁴ 《縣政須知》（廣西省政府民政廳印行，民國23年3月），頁43。

⁶⁵ 黃啓漢，〈民團幹部學校的使命〉，《創進月刊》，卷2期4（1935年），頁22-23。

⁶⁶ 葉志平，《保衛大西南運動下新姿態之廣西》（邵陽：青年圖書館，1940年），頁40。

⁶⁷ 《民國二十三年度廣西省政府施政紀錄·教育》，頁653。

⁶⁸ 晏陽初，〈在二十四年度第五次行政會上的講話〉，宋恩榮主編，《晏陽初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卷1，頁438。

成年國民，多數尚為文盲，缺乏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對於政治多持無政府態度，不明白國民應負的責任，這是他們心理上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不改正，新的政治制度固難樹立，新的政治作用，也難儘量發揮，至於這種缺點之改正，祇有賴於國民基礎教育以推行，沒有國民基礎教育之協助，政治建設，當然無法完成。」⁶⁹這樣，國民基礎教育的愛國教育、生產教育和自治教育三個內容，恰好配合民團自衛、自治、自給三大政策，更加有力地證明了國民基礎教育與民團，尤其是廣西基層政治建設的深層、密切關係。對此，時人有不少形象比喻。黃超凡說，它們是「新廣西社會下的兩位甯馨兒」；⁷⁰白崇禧則言，兩者「恰似一架車的兩個輪子」。⁷¹

（二）國民基礎教育對廣西基層政治建設的推進

國民基礎教育對廣西基層政治建設的貢獻，主要有兩個，一是組織民衆，二是訓練民衆。

1937年2月，雷沛鴻在總結國民基礎教育對廣西政治建設的促進作用時說：

原來政治建設的基本工作，首先在組織民衆，而目前國民基礎教育的唯一功能，便是要把廣西乃至全國民衆一致組織起來，以為中華民族建築廣大深厚的基礎，務使中國四萬萬人各有力量，各有用處。依之，我們更有憑藉這種新教育的力量，造成一個龐大的怪物。這一個怪物實具有四萬萬隻頭，四萬萬張嘴，四萬萬隻鼻，八萬萬隻眼，八萬萬隻耳，八萬萬隻手，八萬萬隻腳，但是它祇有一顆心。這一個怪物的名稱，在英語稱之為 massman，我們譯它為『群人』。這就是把社會的群眾(social masses)合鑄而成為一個群人，必須如是，國民基礎教育的真諦纔能發揮盡致，而其對於政治建設纔有裨

⁶⁹ 黃超凡，〈廣西民團與國民基礎教育〉，《創進月刊》，卷2期4（1935年），頁35。

⁷⁰ 黃超凡，〈廣西民團與國民基礎教育〉，《創進月刊》，卷2期4，頁31。

⁷¹ 〈白副總司令召集各區國民基礎教育指導專員談話紀錄〉，《日刊》，號377（民國25年2月27日），頁4。

益。⁷²

國民基礎教育對民衆的政治組織作用，就是把廣西、中華民族的各個分子，組織、團結成一個人似的，以共赴國難，同心抗日。

邨（街）民大會，是廣西 30 年代中後期基層建設中最主要、最廣泛的政治活動形式，每月集合一次。其含義「爲提起民衆政治興趣及討論邨街應興應革事宜，使民衆漸習尙於政治生活，以期養成其自治能力，而樹立民權政治之基礎」。⁷³即根據地方自治原理，在基層訓練民衆參與民權政治訓練。其功能，「一方面可訓練民衆參加政治，養成自治能力；一方面可以使民衆瞭解政令，和政府合作」。⁷⁴其職權爲：

- 一、 議決各項政令之推行方法；
- 二、 議決本邨街禁約；
- 三、 議決與其他邨街間之禁約；
- 四、 議決邨街長副提議事項；
- 五、 議決各甲長提議事項；
- 六、 議決教職員及團兵與各戶之提議事項；
- 七、 議決本邨街應行興革事項；
- 八、 議決本邨街之預算。⁷⁵

新桂系首領對這種適合廣西基層需要的政治活動方式，非常重視。早在邨街民大會尙未正式舉辦之前，黃旭初就向從事基礎教育的職教人員吹風，打招呼，要求他們注意關心試辦這種新的尙未定名的政治組織方式。⁷⁶1936 年 6 月 1 日，邨街民大會正式開辦，省政府頒佈《廣西中等學校與中心基礎學校推動參加邨街暨參加邨街民大會工作綱要》，明確國民基礎教育在其中的職責。概括起來，國民基礎教育在如下方面參與和推進邨街民大會：

⁷² 雷賓南，〈廣西國民基礎教育運動的時代使命〉，《中華教育界》，卷 24 期 8（民國 26 年 2 月），頁 22。

⁷³ 潘景佳，〈怎樣舉行邨街民大會〉（民團週刊社，民國 27 年 5 月 13 日），頁 28。

⁷⁴ 亢真化編，〈黃旭初先生之廣西建設論〉，頁 89。

⁷⁵ 〈廣西各縣邨街民大會規則〉，雷殷，〈地方自治〉（1939 年），頁 190。

⁷⁶ 黃旭初，〈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建設〉，頁 26。

首先，從參加者身份來說，邨街民大會所在邨街的「國民基礎學校教職員暨年滿十四歲之學生與本邨街民團後備隊團兵應一律出席邨街民大會」。⁷⁷鄉鎮邨街甲長、基礎教育各級學生、民團後備隊團兵、及婦女隊隊員，必須積極參與邨街民會的宣傳工作，動員民衆自動自覺參加邨街民大會。⁷⁸

其次，貼告示，幫助召集會議。告示格式如下：

本邨（街）__月邨（街）民大會定於__月__日__時開會，到時鳴號，各戶須派一人隨同甲長出席爲要。

邨（街）公所謹告

邨（街）長_____

附議論事項，如：「本邨基礎學校的基金，應如何籌集，請公決案」；「本邨公所學校的圍牆已經崩壞，應如何征工修築，請公決案」；「本邨環邨道路，應如何修築，請公決案」。⁷⁹

再次，通過組織方式，即特在各國民基礎學校組織推動邨街民大會的工作委員會，將學生分成若干隊，隊長由教職員擔任，下設宣傳、指導、調查、遊藝四股，各股股長由學生分任，「各隊分別固定長期參加某一個或幾個邨街民大會」，行使自己的權力，推動基層政治建設。⁸⁰所以，有人說推動和指導廣西邨街民大會「最大的力量」，算是各級基礎學校的員生。⁸¹可見，國民基礎教育對推動邨街民大會的進行，起了相當作用。

廣西當局通過國民基礎教育，推動邨街民大會發展，目的是爲了加強對基層的政治控制。但在廣西，它畢竟是清末以來，一直高唱的「地方自治」的口號，在行動上的一次較大規模的嘗試，初步實施了地方自治的訓練。這與原來百姓對政治冷漠、毫無集議觀念、被動接受命令的情況相比，不啻是

⁷⁷ 〈廣西各縣邨街民大會規則〉，雷殷，《地方自治》，頁188。

⁷⁸ 潘景佳，《怎樣舉行邨街民大會》，頁8-9。

⁷⁹ 潘景佳，《怎樣舉辦邨街民大會》，頁10-11。

⁸⁰ 雷沛鴻，〈六年來廣西國民基礎教育〉，《雷沛鴻文集》，下冊，頁256。

⁸¹ 潘景佳，《怎樣舉行邨街民大會》，頁29。

一件新鮮事。黃旭初在評價邨街民大會的效果時說：「現在，民衆至少已經瞭解公共的事情，個人皆有發言的權利，而且更有應盡的義務，漸漸養成自動的精神，也漸漸加強了自決的能力」。⁸²就地方事務言，政府命令經邨街大會討論，邨民發表意見，大家共同議決，效果比原來強迫去做要好。總之，政府命令自上而下，在基層藉邨街民大會為媒介，很快得到貫徹。1938年，陶行知(1891-1946)在桂考察後，承認「廣西政治的運用非常迅速」；⁸³更有人認為，數年來廣西政治教育最大成就之一，是「政令下達，民衆都知道服從政府命令」。⁸⁴這在抗日戰爭時代，無疑十分重要。

邨街民大會雖以政治民主、地方自治面目出現，但離真正民主政治仍很遙遠。廣西省政府擬通過國民基礎教育促進邨街民大會發展、實行地方自治，但由於教育做得不夠，事實上民衆自覺參加邨街民大會的積極性不高，效果亦欠佳。曾親歷邨街民大會的旅桂教育家童潤之對此作了批評：

我曾參觀過幾個邨民大會，男女成人丟了農具，帶著汗，扶老攜幼的惠然參加，這充分顯示上令下行的成效。民衆的集合已不成問題，所成問題的是民衆費了半日的時間，遠道來參加大會，究竟得著些什麼！當主席的似乎毫無準備，也無主持大會的能力；除以命令的口吻，枯燥的言辭，報告政令及時事而外，別無其他活動。民衆興趣索然，秩序紊亂，因之戶主每藉口不去，讓婦女兒童去塞責。在會場中，民衆既無討論，也受不到公民集會應有的訓練；於是一個最有意義而很普遍的集會，在邨長與民衆心目中，成為每月的例行公事而已。其中的原因，是僅有上行下效的政治力量以集合民衆，而無教育的力量以培養民衆集會參政的智慧。教育的功夫不夠，自治就無真正的基礎。⁸⁵

⁸² 黃旭初，《縣政建設與基層建設》，頁278。

⁸³ 陶行知，〈抗戰中的新廣西〉，《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卷4，頁288。

⁸⁴ 趙冕，〈拿成人教育強調廣西的政治與教育〉，《教育與民衆》，卷9期2（1939年5月25日），頁20。

⁸⁵ 童潤之，〈對廣西教育的一個建議〉，《建設研究》，卷1期4，頁7。

建議廣西當局加重教育份量。無獨有偶，另一個叫趙冕的人，在廣西實地考察二個多月後，對邨街民大會中教育的不足，也提出了相同看法。他說自己：曾披閱過關於地方自治的全部規劃，也曾實地參加過由基礎學校教員實際主持的邨街大會，照當局的規劃原意，邨街民大會應當是富有成人教育意味的活動，但實際上則全未做到！我們覺得：教育如果不能領導政治，至少得與政治配合，或跟得上政治，卻不可老是遠遠地甘心落在後邊。⁸⁶

由此觀之，教育與政治緊密結合，有時也互相擠佔，此既是廣西教育的特點，也是其缺點。

四、教育與經濟

《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六年計劃大綱》的主旨規定，國民基礎教育，要助成廣西的經濟建設。這清楚表明了二者之關係。1935年7月，有人因廣西國民基礎教育需大量支出，認為與經濟建設有抵觸。雷沛鴻對此加以反駁：經濟建設發展不快，要在經濟建設的本身找原因，不能歸咎國民基礎教育。相反中國農業發展水平落後，「都是因為農民文化程度不能應付現實環境所致」；提倡加強國民基礎教育，對經濟發展不但沒有「絲毫妨害」，反而會「幫助經濟建設之順利進展。」⁸⁷國民基礎教育對廣西經濟建設的促進作用，大抵可從如下方面展開。

（一）造就生產人才

1. 培養經濟幹部

廣西民團幹部學校在培養和使用人材上，採取從哪來，回哪去原則，學生一旦畢業回到基層，就擔負起經濟建設的組織和領導重任。廣西民團幹

⁸⁶ 趙冕，〈拿成人教育強調廣西的政治與教育〉，《教育與民衆》，卷9期2，頁20。

⁸⁷ 雷沛鴻，〈我國農田水利問題之重要〉，《日刊》，號160（民國24年7月14日），頁2。

部學校開設的與經濟建設有關的課程，主要有生產教育、農業技術、合作組織等。⁸⁸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特別是經過合作組織訓練的畢業生，他們擔任各地基礎學校的導師後，對推動合作經濟，負有領導責任，起了組織者作用。其工作，成為各校推行合作運動不可缺少的一環。因他們在學校時，「對於合作運動的理論與實際，都受過較深切的訓練，便應領導學生與當地民衆，指導他們去組織合作社、或農邨倉庫、耕牛會等，以收到合作的實效」。⁸⁹同時，民團幹部學校學生在畢業前，須到省政府在全省八大行政區所設置的農邨示範場，進行生產教育實習。以設在武鳴的南寧區農邨示範場為例，據中國社會教育社廣西考察團 1936 年 1 月報告，該場「分農藝、園藝、森林及畜牧四部。農藝方面注重水稻、煙葉、玉蜀黍及棉花；園藝注重香蕉、柚子、蔬菜等；造林則以松、案、桐為主」。⁹⁰在這裏，民團幹校學生把所學理論知識放到實踐中實習、檢驗，初步參與了廣西經濟建設。

2. 訓練生產骨幹

從國民基礎教育內容上說，生產教育是骨幹；從「三自」政策的自給政策說，則是「靈魂」。⁹¹為加強培養生產人才，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設有生產教育系。1935 年，研究院工作重心為生產教育。為此，雷沛鴻擬就該年度〈工作進行計劃總綱草案〉。其中人才訓練就有三項：生產教育人員訓練班設計；冬作講習班設計；合作講習班設計。⁹²此外尚有暑期講習會、農邨服務人才訓練班（由柳州沙塘農邨建設試辦區主辦，研究院密切配合）等計劃。影響較大的，是生產教育人員培訓班和 1935 年度以生產教育為中心的暑期講習會。

⁸⁸ 黃啓漢，〈民團幹部學校的使命〉，《創進月刊》，卷 2 期 4（1935 年），頁 23。

⁸⁹ 廣西省政府教育廳導學室編印，《國民基礎學校各科教學法》（民國 26 年 7 月印行），頁 181。

⁹⁰ 中國社會教育社廣西考察團編輯，《廣西的教育及其經濟》（無錫：民生書局，民國 26 年 3 月），頁 73。

⁹¹ 曾日東，〈談談生產教育〉，《日刊》，號 339（民國 25 年 1 月 12 日），頁 6。

⁹² 雷沛鴻，〈本院廿四年度工作進行計劃總綱草案〉，《雷沛鴻文集》，續編，頁 321。

爲使這兩個訓練計劃達到預期目的，雷沛鴻特聘請鄉邨建設代表人物、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院長章之汶(1900-?)主持其事。⁹³章氏對研究院生產教育的主要貢獻有二：一是起草了《二十四年度生產教育實施計劃草案》，⁹⁴提出該年度研究院的工作重點，以做好充實研究院實驗場所、訓練生產幹部和輔導推行生產教育三件實事；二是主持招考並開辦了生產教育人員訓練班和 1935 年度暑假講習會。是年 8 月 26 日，由公開招考錄取的 31 名學員組成的訓練班正式開學。雷沛鴻、章之汶先後在開學典禮上講話，強調生產教育開設訓練班的重要性。章之汶認爲，訓練班專門「注重農業工業人才之培養，與各省不同」，乃廣西首創。⁹⁵該班開設國文、數學、物理、氣象、森林、園藝、國民基礎教育和音樂等 9 門課，學制三年。施教原則爲：「不側重課本及講義，而注重從『做』中學習，兩手幫大腦」；「就本省取材，力避注入方式」；「注重實地工作，個別指導，分組研究」。⁹⁶1936 年 6 月，研究院因故停辦，但生產教育培訓班並未終止，經呈准，轉到原來與研究院有學術聯繫的柳州沙塘農業技術人員訓練班，繼續學業。種子播下，總會有收穫。生產教育訓練班開辦，在廣西生產職業教育史上，有首創之功。省外專家認爲，廣西農業雖然資源豐富、條件優越，但農業教育不足。1936 年，中國社會教育社廣西考察團在考察廣西教育和經濟後，對廣西經濟發展的評議之一，爲「注重農業建設，忽略農業教育」。各縣均有農業機關之設置，但此項中級農業人才之訓練，「祇有研究院的生產教育人員訓練班負責，顯然不夠」，建議「似應增設其他訓練機關」。⁹⁷廣西農業教育的不足，更

⁹³ 教育家傅葆琛在列舉鄉邨建設代表人物時，有章之汶的名字。見陳俠、傅啓群編，《傅葆琛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403。

⁹⁴ 章之汶，《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二十四年度生產教育實施計劃草案》（無出版地點和時間，桂林圖書館藏），頁 1。

⁹⁵ 〈紀念周暨本院生產教育人員訓練班開學典禮記〉，《日刊》，號 206（民國 24 年 8 月 28 日），頁 2。

⁹⁶ 徐明、朱紫華，〈生產教育人員訓練班半年概述〉，《國民基礎教育叢訊》，號 12（民國 25 年 1 月），頁 74。

⁹⁷ 中國社會教育社廣西考察團編，《廣西的教育及其經濟》，頁 45。

襯出生產教育訓練班開設之可貴。

1935年，研究院暑期講習會由該院生產教育系籌辦，章之汶總其成。這次講習會和以往專門訓練師資不同之處，在以「生產教育為中心」。⁹⁸講授課程涉及生產教育者，計有18次之多。其中畜牧獸醫(2次，下略單位)、農業統計(2)、合作(3)、農業推廣(2)、農業改良(2)、工藝(1)、造林(1)、土壤(2)、病蟲害(1)、基礎學校之生產教育(2)。⁹⁹章之汶負責講授農業推廣和農學改良課程令人印象深刻。恰逢《廣州民國日報》記者來研究院採訪，將這一幕記錄下來：「該院國民基礎教育講習會在講生產教育，教授肥而白，身著夏布長衫，據說是特地由南京中央大學請來的；學生黑而瘦，著灰色制服，據說都是各縣的教育行政人員，特地調來訓練的。」¹⁰⁰在這裏，重要的不是妙筆生花的記者如何將教師與學生所作的鮮明對比，也不是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記者，將章之汶供職單位的南京金陵大學誤作中央大學，而是得知這次暑假講習會參加者，多為各縣的教育行政人員。通過名家講授，這些人回去之後，多少會從教育行政角度，加強生產教育實施。這對各地的經濟建設，當會有所促進。

3. 提高生產者素質

國民基礎教育之生產教育的目的和意義，在於「訓練學生以生產技術知識，使畢業後從事瀕於破產的農業及工業的生產，以抗拒國際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及復興凋敝的農邨」。¹⁰¹它與廣西經濟建設的關係，黃旭初從施政角度說得尤為直接、明瞭：「我們要想經濟建設成功，必定要用科學方法改良生產的技術，有了良好的生產技術，還要農民知道技術的運用。但要使人民知道運用技術，這就非發展文化建設，提高人民的知識程度不可。所以

⁹⁸ 〈本院同樂會誌盛〉，《日刊》，號204（民國24年8月26日），頁2。

⁹⁹ 〈二十四年度本院生產教育系會議紀〉，《日刊》，號169（民國24年7月21日），頁7。

¹⁰⁰ 廣州民國日報記者，〈廣西大學與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轉引自龔家瑋主編，《廣西新教育之觀感》，頁71-72。

¹⁰¹ 陳家盛，〈實施生產教育的先決問題〉，《群言》，卷11期2（民國23年3月15日），頁5。

省府近來很注意於成人教育的設施，一方面灌輸以識字教育，一面灌輸以農業手工業各種改良的技術。」¹⁰²認識到經濟建設要成功，科學生產技術重要，掌握、運用生產技術的人的素質提高，更為重要。通過國民基礎教育，訓練經濟建設的組織者、骨幹和直接從事生產的勞動者，提高他們的管理水平和生產水平，這在生產教育不發達的廣西，具有特別的意義。

（二）實施生產教育

雷沛鴻把生產教育規定為，「指導農民採用新的生產技術：改良種子，興築水利，應用科學的農具」。¹⁰³也有人把它定義為：「在教導或改進一般成人與兒童，尊重勞動，具有勞動精神，運用新的生產方法，進而認識社會的生產、消費、分配各方面的關係。」¹⁰⁴範圍略有不同，中心都是採用新技術，提高生產力。生產教育的試驗，主要由專家薈萃、技術力量較好的研究院負責。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 1935 年生產教育計劃實施草案中，實驗工廠的農具製造，包括犁、耙、鋤、脫粒機等種類。實驗農場方面，農藝「側重稻作改良」；園藝「側重菓樹改良」；森林「側重經濟樹木造林」；畜養「側重牛豬雞選種」。¹⁰⁵進程式為，先研究試驗，後輔導，「俟有相當成效，再行普及全省」。1935 年 3 月，《南寧民國日報》記者參觀研究院畜牧場，看到院內有「各種各樣豬種十頭，及雞近百尾。聽說這項豬雞種子均由各國、各省、縣採買來的優良種子，現運用雜種交蕃殖和試驗參養法，作生產量數比較、初生時體重比較、生長時間速率的比較。這時正在研究與實驗中，將來結果自然推行教育到農邨裏」。¹⁰⁶此外，研究院試驗農業生產，還注意到從廣西實際出發，注重鄉土材料。國立中山大學農學教授丁穎(1888-1964)說：「我參觀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覺得很有希望，很有興味。……

¹⁰² 亢真化編，《黃旭初先生之廣西建設論》，頁 24。

¹⁰³ 雷沛鴻，〈新教育與新秩序〉，《雷沛鴻文集》，下冊，頁 54。

¹⁰⁴ 曹德全，〈幾個農邨副業的調查〉，《國民基礎教育叢訊》，號 12（民國 25 年 1 月），頁 66。

¹⁰⁵ 章之汶，〈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二十四年度生產教育實施計劃草案〉，頁 1。

¹⁰⁶ 極天，〈我所見的國民基礎教育〉，《南寧民國日報》，民國 24 年 3 月 26 日。

該院課本注重鄉土材料，實為農業改進的好因數，如定縣等的鄉邨教育運動是否能成功，尚有疑問，但廣西的國民基礎教育，能夠這樣從鄉土實況，從農業生活做起，自然很有意思。」¹⁰⁷

實施生產教育，如僅從國民基礎學校內部而言，指各校自辟場地，自行生產，自給自足。現分別以一所中心國民基礎學校和一縣國民基礎學校實施生產教育為例，加以論證。邕甯縣表證中心國民基礎學校，在《三年度工作計劃綱要》中，僅第一年度，生產教育實施的專案就有八個：

1. 開闢苗圃播種樹苗；
2. 開闢校園種植蔬菜及花卉；
3. 修葺畜牧場並領導學生養雞養鴨養鴿養豬，作實驗選種及參養方法的準備；
4. 利用野外生活或旅行時節，領導學生採集材料，自製標本；
5. 鼓勵兒童家庭作業；
6. 調查當地生產品的數量品質和銷路；
7. 試驗小廚房辦法；
8. 利用廢物及本地生產原料自製校具。¹⁰⁸

又如位於廣西東北的恭城縣，制定了《各級基礎學校實施國民基礎教育暫行準則》，經省政府備案。其中，關於生產教育的實施，也有五條很具體的計劃和要求：

1. 飼養豬、牛、羊、雞、白鴿等物，每校須飼養家畜二頭以上，家禽四隻以上，達到壯碩成熟期即變賣，除將贏利提為學校經費以獎勵參養人獎金外，其本金應繼續購養，惟須報告鄉鎮公所轉報備查；
2. 中心校須辟地三畝以上，邨街基礎學校須辟地一畝以上，實施種植蔬菜、薯煙、瓜菓。至墾荒、造林、公耕等項，照章按步進行，

¹⁰⁷ 丁穎教授演講，陳樹才簡略筆記，〈廣西全省農業討論會之觀感——在中大農藝研究會演講〉，《群言》，卷12期5（民國25年1月15日），頁15。

¹⁰⁸ 《廣西邕甯縣表證中心國民基礎學校校刊》，頁19-20。

並須先有詳細之計劃呈報縣府備查：

3. 改良奢侈風俗習慣，並組織生產合作社以開採本縣礦產或組織消費合作社以營子利；
4. 自營工藝：如製造粉筆、肥皂、漿糊以及科學玩具、裝訂簿冊等；
5. 採集標本，製造模型以作教具，或搜集農產物開會展覽，以資觀摩而期改良。¹⁰⁹

邕寧是廣西當時的先進縣，恭城則為後進縣，經濟發展水平不一，但基礎學校對生產教育的實施，均有詳細計劃，可謂不遺餘力。恭城全縣對生產教育作統一籌劃，尤其是第一條規定：飼養家禽家畜所得利潤提作學校經費。自籌經費辦學，節約政府公帑辦學支出，實際上就支援和促進了廣西基層經濟建設。這一點，黃旭初看得比較清楚。他在談到廣西基層經濟建設時，認為主要有鄉邨造產、救濟農邨經濟和各級國民基礎學校實施生產教育三途徑。就實施生產教育而言，省政府和教育廳作出要求，「已督飭各校造林」，並規定自 1935 年起，「各校都要試行自營園藝及牧養牲畜，以增加學校款項的收入，以期達到用很少的庫款，辦很多而且很好的學校；在人民方面，也可以減輕負擔。」¹¹⁰按 1940 年全省國民基礎學校和中心基礎學校共 21,571 所計，¹¹¹如果每校都能按上述要求實施生產教育，所得收入當十分可觀，從而為省政府節約一大筆費用。從經濟學角度說，節流就是建設。因此，國民基礎教育實施的生產教育，實際上促進了廣西經濟建設的發展。

（三）參與基層經濟建設

1934 年 4 月 9 日，雷沛鴻重回他工作過的江蘇教育學院考察，並報告廣西國民基礎教育情況。認為國民基礎教育對基層經濟建設之最低限度要求有三：「開浚水利」——預期全省每鄉每邨都要重視開水渠；「每邨或數邨聯合組織農業倉庫」——在國民基礎學校所在地組織倉庫；「與經濟委員

¹⁰⁹ 廣西省政府編輯室，《廣西省政府公報》，期 121（民國 25 年 5 月 17 日），頁 110。

¹¹⁰ 允真化編，《黃旭初先生之廣西建設論》，頁 86-87。

¹¹¹ 〈1932-1940 年廣西國民基礎教育實施概況〉，《桂政紀實·文》，頁 89-90。

會合作，辦理信用、生產、運輸各種合作事業」。¹¹²國民基礎教育對各種合作事業非常重視，並以「各邨之國民基礎學校為推行合作運動之中心」，¹¹³以建立新的經濟組織和生產方式。依雷沛鴻之助手盧顯能的經驗和總結，國民基礎教育參與了「公共造產運動」、「改進農業生產」、「倡導合作運動」、「推行節約運動」、「提倡家庭副業」五大方面的經濟建設。僅以公共造產運動為例，就包括「厲行公耕；籌設邨（街）倉；建造公共建築物，如建築鋪屋、水碾、糖油榨、磚瓦灰窖、或其他能生產的建築物，出租生息；修築邨（街）公共工程，如築塘壩、架設水車等；經營牲畜事業，如飼養牛羊、及其它牲畜、養魚等；舉辦信用借貸，將公共存有現金設法撥充資本，經營信用借貸；墾荒種植，經營公有園林等，以發展邨（街）集體化的經濟建設。」¹¹⁴

國民基礎教育對廣西經濟建設究竟起了多大的促進作用，目前尚缺乏足夠、直接的證據，但據一些間接材料，國民基礎教育在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黃旭初曾說：「廣西對於公共造產的努力，是國內最為出色的建設工作，其效果亦大有可觀。不過這種工作主要的實施單位，仍屬基層，縣的一級並沒有多大的成就。」¹¹⁵廣西的公共造產未必是全國最出色的，但成績主要在基層，則大體可信。從上可知，國民基礎教育涉及公共造產的方方面面，當為廣西經濟建設盡了一份力量。黃旭初認為，廣西合作經濟也不錯，合作機關雖不多，但「用各邨力量建築全鄉墟場商店的合作，極有成績，邕甯縣為尤著。」¹¹⁶該縣 1936 年前是廣西省府所在地、雷沛鴻的家鄉，為辦理國民基礎教育成績最好的縣份之一。由此也可推知，以國民基礎學校為合

¹¹² 雷賓南，〈最近的廣西教育〉，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上冊（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152。

¹¹³ 〈金國寶演講廣西之經濟建設〉，《教育週報》，卷3期2（民國22年3月14日），頁20。

¹¹⁴ 盧顯能等編，《國民基礎教育實施法》（廣西省政府教育廳編審室，民國29年），頁319-320。

¹¹⁵ 黃旭初，《縣政建設與基層建設》，頁212。

¹¹⁶ 亢真化編，《黃旭初先生之廣西建設論》，頁154。

作運作中心的國民基礎教育，於廣西合作經濟的發展，當有不小的關係和貢獻。

生產教育對緩解 30 年代廣西農邨經濟崩潰和枯竭的嚴峻形勢，蓄積廣西抗日戰爭所需的物質力量，起到了相當作用。對此，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教授范琦在論及廣西教育特徵時，給予「教育生產化」的讚語。¹¹⁷

五、教育與文化、軍事

（一）國民基礎教育與基層文化建設

廣西基層文化建設，包括普及國民基礎教育、辦理巡迴文庫、開辦民衆閱覽室、設置民衆問學代筆處、組織民衆共學團或讀書會。協助改良風俗習慣、提倡正當娛樂，¹¹⁸以及進行政會、時事報告、抗戰須知等文化宣傳事業。¹¹⁹在此著重論述國民基礎教育與改良風俗習慣之關係。廣西的不良社會風俗，據《廣西省改良風俗規則》所載和專家的研究，最普遍的有以下幾種：「迷信的」，包括星、相、巫、卜、風水、迎神、信命運等；「野蠻的」，如指腹爲婚、早婚、溺女、不落夫家、纏足、束胸等；「邪惡的」，包括吸毒、賭博、嫖、娼、酗酒、遊惰等；「虛偽的」，指婚喪生壽的浪費和無謂的應酬等。¹²⁰

這些陋習和舊俗的存在，對廣西建設產生了不利影響。迷信的人們，既崇拜鬼神，就會對政府的新建設事業「取懷疑態度，而不予通力合作」；撥充廟產興辦鄉邨教育本是益事，但信神者爲維持廟宇香火，「每每多方面阻撓，使計劃不能順利進行」。這在文化落後的縣份尤甚。再有迷信者燒紙燭香炮、問星卦，廣西每年耗費的總數約 380 萬元以上，對貧窮廣西，數目

¹¹⁷ 《南寧民國日報》，民國 23 年 4 月 8 日。

¹¹⁸ 盧顯能等編，《國民基礎教育實施法》，頁 321-322。

¹¹⁹ 梁上燕，《廣西建設》，頁 48。

¹²⁰ 寧瑚，〈建設新廣西與改革風俗〉，《群言》，卷 20 期 2（民國 24 年 4 月 25 日），頁 45。

不小。¹²¹據載嫁女不落夫家的風俗，一方面對徵兵是一種巨大阻力。許多不明大義的婦女，每以不落夫家為由，脅迫丈夫不去應徵，影響了抗戰；另一方面，男方傾家蕩產娶妻，女方卻拒絕過門，丈夫不堪打擊，走向墮落，影響了治安。據廣西民團幹部學校第五期學生在邕甯縣沙井鄉樂新邨實習時調查，造成這種怪異現象的社會原因有早婚、盲婚、夫家虐待、娘家縱容、十姊妹維繫、風流館等。¹²²情況嚴重者一邨竟達 39 人之多；在不落夫家的女子中，有 27 年未歸夫家的。此項習俗之根深，實在驚人。雖然它不乏反抗封建婚姻壓迫的積極意義，但無疑造成社會問題。¹²³婚嫁喪祭的儀仗，虛糜錢財，也往往導致民衆家道中落，負債破產。¹²⁴

改良風俗之法，有治標、治本兩途。治標即運用政治力量，如嚴厲執行《改良風俗規則》，訂定改良風俗應守禁約等。治本則為「運用教育的力量，提高民衆文化水準，改良其生活」。¹²⁵改良風俗較徹底之法，要數普及教育，因為教育是啓發智慧、提高知識的工具，人民有了知識，纔能判斷事物優劣，分析其得失。譬如迷信的風俗，多為下層社會無知男女保存，因其不瞭解迷信弊害之故。¹²⁶又如通過教育，民衆掌握了衛生常識，就不會承認有痘將麻神的存在，而知道種牛痘可預防天花，打防疫針可預防疫症傳染。取締婦女不落夫家舊習的辦法之一，是在國民基礎教育的「成人教育婦人隊」中宣傳，¹²⁷爭取婦女積極配合，以求解決。1939 年，廣西成人教育年實施後，民衆「生活態度即向上轉變，實為一大收穫。此種轉變之特徵，即在集體生活之漸次養成……至不良風俗，如賭博、婦女婚後不落夫家、迷信等之

¹²¹ 寧瑚，〈建設新廣西與改革風俗〉，《群言》，卷 20 期 2，頁 46-47。

¹²² 盲婚：不願意守父母之約；十姊妹：當地有一種結拜姐妹的組織，往往對居夫家稍久者，盡為笑罵、唾棄，不與為伍；風流館：男女自由結合。

¹²³ 亢真化、梁上燕合著，《改良風俗的實施》（民團週刊社，民國 27 年 6 月 20 日），頁 7-14。

¹²⁴ 廣西省政府民政廳印行，《縣政須知》之 14（民國 23 年 3 月），頁 8。

¹²⁵ 亢真化、梁上燕合著，《改良風俗的實施》，頁 20。

¹²⁶ 寧瑚，〈建設新廣西與改革風俗〉，《群言》，卷 20 期 2，頁 46-47。

¹²⁷ 亢真化、梁上燕合著，《改良風俗的實施》，頁 15。

破除，尤其餘事」。「至於婦女勸導其兄弟夫婿服務兵役者，亦屢見不鮮」。¹²⁸總之，對於改造 30 年代廣西基層社會種種風俗來說，國民基礎教育與政治手段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教育效果或許不能立竿見影，但猶如中藥治頑症，日久可逐漸根治病源。

（二）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軍事建設

雷沛鴻認為，軍事建設，「不但要在軍備上力求相當的充實，軍制上力求改善，軍器上力求精良，而且要在人民智慧上力求提高水準。」而要提高人民智慧，要訓練和組織民衆，就「必須有賴於」教育，「尤其是國民基礎教育」。¹²⁹國民基礎教育與軍事建設，就制度而言，主要表現在兒童實施軍訓、成人按民團編隊。

30 年代廣西實施「寓將於學」政策，普遍要求學生軍訓，¹³⁰包括未成年兒童。按白崇禧的說法，中心國民基礎學校學生，要「施以童軍訓練」。¹³¹其做法及意義，據《縣政須知》載：「以智仁勇三字的精神，訓練未成年的童子，使其有處理事變的智慧，仁民愛物的感情，勇往果斷的氣魄，暨遵守法律注意衛生的習慣，以養成良好的國民……，如果童子軍訓練普及了，則我們中國便成了有組織、有秩序、有紀律的國家」。因此，童軍訓練成爲廣西省政府切實舉辦的「要政」之一。¹³²1936 年 12 月公佈的《廣西省成人教育實施辦法》，爲使教育協助《廣西建設綱領》之實行，增加民團訓練知識，規定成人教育編制，按民團編制方式進行。第三條規定：「各縣實施成人教育，凡十八足歲以上至四十五足歲以下之男子，應利用本省原有各邨街民團後備隊之編制，分隊或分排分班施教，即以民團後備隊之隊、排、班長爲成人教育隊之隊長、排長、班長。其十八足歲以上至四十五足歲以下之婦

¹²⁸ 轉引自鍾文典主編，《20 世紀 30 年代的廣西》，頁 710。

¹²⁹ 雷賓南，〈廣西國民基礎教育運動的時代使命〉，《中華教育界》，卷 24 期 8，頁 23。

¹³⁰ 詳參鍾文典主編的《20 世紀 30 年代的廣西》，頁 570-583，惟該書對童軍訓練論述不多。

¹³¹ 白崇禧，《國防與教育》（桂林：全面戰週刊社，1930 年），頁 48。

¹³² 《縣政須知》，頁 41。

女，並應依照民團後備隊編制辦法，編制成隊，集合施教。」¹³³

全面抗戰爆發後，為適應戰時特殊形勢需要，採取綜合編隊方式，進行機動教育。1938年12月公佈的《戰時廣西各縣基礎教育實施辦法》等法規規定，兒童教育方面，由各鄉鎮中心國民基礎學校負責，將本鄉鎮失學學生，無論原屬本鄉鎮或外籍，「均分別編為國民基礎教育隊」，隊下分若干組，進行室外教學。¹³⁴這是戰時按軍隊方式組織國民基礎教學的一種特殊方式。

國民基礎教育對軍事建設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如下：

1. 協助訓練民團

1934年，省政府頒佈《民團後備隊施行民衆補習教育辦法》和《民團後備隊補習教育施行細則》。兩個法令的第一條分別規定，「全省民團後備隊在訓練期間，一律兼施民衆教育」；「民團後備隊補習教育以完成識字訓練及公民訓練為目標」。¹³⁵按白崇禧在〈廣西的軍事教育與國民基礎教育〉一文的說法，國民基礎教育是軍事建設的基礎，通過國民基礎教育，可以「喚起民族意識」，「喚起民衆對愛國軍人的認識和同情」；來自民衆的軍人受教之後，能認字，有知識，就可以「看操典法令，作報告，說話有條理，腦筋清楚」。白崇禧並將當時廣西軍隊與舊桂系軍隊相比較，強調國民基礎教育在廣西軍隊建設中的作用。¹³⁶1935年1月14日，雷沛鴻在廣西軍校作〈國民基礎教育與軍事政治建設的關係〉演講時，援引白崇禧上述觀點，論證國民基礎教育與軍事政治建設相互作用的重要性，特別指出，「訓練民團，必定要國民有教育基礎纔行」。¹³⁷雷沛鴻的部下張家成對此作了進一步發揮，認為國民基礎教育，可以「指示民衆國家民族的危機，及國民保衛國家、民

¹³³ 轉引自《廣西國民基礎學校辦理通則》（廣西省政府教育廳編印，無出版時間），頁84。

¹³⁴ 〈國民教育實施〉，《廣西教育史料》（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548。

¹³⁵ 轉引自徐旭，〈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的前程〉，《中華教育界》，卷22期1，頁128。

¹³⁶ 白崇禧，《國防與教育》，頁19。

¹³⁷ 雷沛鴻，〈國民基礎教育與軍事政治建設的關係〉，《雷沛鴻文集》，續編，頁218。

族的義務，常使民團訓練，易於推行。」¹³⁸

2. 協助辦理徵兵

「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這是當時中國民間流傳的一句話，可見對軍人的輕視，因此，長期以來，徵兵並非易事。廣西借助國民基礎教育力量，宣傳徵兵意義，解釋徵兵條例，說明編徵辦法，鼓勵徵兵入伍，舉行歡送新兵大會。士兵入伍後，國民基礎學校協助執行優待徵兵家屬條例，慰問徵兵家屬，及慰勞入伍士兵等，以利兵役制推行。¹³⁹這種做法受到遊桂省外人士好評。一次廣西徵兵八千名，「先期在各處宣傳國民兵役之必要，事後又令各處舉行盛大的歡送新兵入伍式，居然將八千額數，如限召集。」¹⁴⁰抗戰期間，廣西先後出兵 50 萬，成績卓著。有人在總結其成功經驗時，認為原因之一在於普及國民基礎教育，使「教育與宣傳打成一片，使教育方針與政治目標合而為一，預先普遍的造成了民衆抗戰的心理，及其為國家民族而犧牲的精神，遇有命令，則爭先恐後的為國效死，這些都是民衆動員極端重要的準備。」¹⁴¹此外，國民基礎教育與軍事建設相配合，使兵源文化素質和質量有所提高，增強了廣西軍隊的抗戰能力。1934 年 12 月和 1935 年 5 月，廣西舉行第一、二屆徵兵，「其成績頗有可觀，不僅志願應徵者頗見踴躍，而曾受教育者尤居多數。」¹⁴²抗戰期間，廣西軍隊屢建戰功，當與士兵文化素質較好不無關聯。

3. 「領導戰時後方勤務」

在全面抗戰爆發，尤其在廣西淪陷後，國民基礎學校師生，積極參加防護、徵募、鋤奸、運輸、救濟、通訊諜報、保護交通、協助軍隊、修築防禦工事等工作，作出較好貢獻。¹⁴³

¹³⁸ 張家成，《國民基礎教育實施法》，頁 25。

¹³⁹ 盧顯能等編，《國民基礎教育實施法》，頁 322。

¹⁴⁰ 冷觀，〈粵桂寫影〉，《廣西印象記》，頁 16。

¹⁴¹ 《廣西之建設》，頁 170。

¹⁴² 賴于彥主編，《廣西一覽·民團》（廣西印刷廠，1936 年版），頁 14。

¹⁴³ 盧顯能等編，《國民基礎教育實施法》，頁 322-323；李彥福等編，《廣西教育史料》，

結論

國民基礎教育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積極、全面參與廣西基層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四大建設，成效不俗。雷沛鴻認為，它「針對四大建設需要，作有計劃的設施，使教育普及於民衆，而動員民衆參加各種建設事業，在助成建設這方面，國民基礎教育已發揮了很大的效能。」¹⁴⁴繼任廣西教育廳長邱昌渭（生卒年不詳）則從社會整合角度說：「本省建設，雖分為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四大部門，但有其整個性，連鎖性與一貫性，各部門工作之進行，是分工合作，協同一致的，這在教育方面，是盡了相當的力量了的。」¹⁴⁵鄉邨教育專家傅葆琛(1893-1984)更從教育與民團訓練關係上，推許國民基礎教育的作用和影響：「廣西省現行之『三寓政策』，¹⁴⁶實開我國兵民政策之先聲。此種民團訓練，在廣西已著成績。廣東近來亦仿廣西辦法，抽調壯丁，編制警衛隊；他省亦多聞風繼起。我們須知廣西之『三寓政策』之所以能具體化、普遍化，乃由於實施『基礎教育』」。¹⁴⁷當然，這種教育在不同建設領域中，產生的效果不同。軍事最著，政治次之，經濟和文化又次之。這與朱滋源先生研究廣西初期現代化的結論：「政治最長，文化次之，經濟再次之，而社會殿后」有相近之處。¹⁴⁸這種結果與 1935-1940 年廣西建設的重心制約有關，廣西民國 30 年 8 月以前的建設著重於軍事政治，因此軍事政治兩種建設，成績最優，至於「經濟文化兩種建設，則因人力財力之缺乏，不免有膛乎其後之感。」¹⁴⁹在廣西建設整體性和連鎖性特徵下，國民基礎教育的功能和成績，已經整合和消溶在基層各項建設之中，不易量

頁 549。

¹⁴⁴ 雷沛鴻，〈六年來廣西國民基礎教育〉，《雷沛鴻文集》，下冊，頁 267。

¹⁴⁵ 邱昌渭，〈七年來的廣西教育〉，《廣西之建設》，頁 464。

¹⁴⁶ 指「寓徵於募，寓兵於團，寓將於學」。

¹⁴⁷ 傅葆琛，〈民衆教育與地方自治及社會生產的關係〉，陳俠、傅啓群編，《傅葆琛教育論著選》，頁 330。

¹⁴⁸ 朱滋源，〈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1860-1937〉，頁 573。

¹⁴⁹ 梁上燕，〈廣西建設〉，頁 72-73、53。

化。但這並不意味著國民基礎教育在參與廣西基層社會建設中已盡善盡美。

1935年，由俞慶棠(1897-1949)、劉平江(生卒年不詳)等數十位專家組成的中國社會教育社廣西考察團，在考察廣西的教育與經濟後，經集體討論，以建議形式謹慎地表示了他們的意見：「廣西對於自給已甚重視，然以經濟建設與教育實施之溝通，似尚未見充分有效。」¹⁵⁰童潤之也說，廣西經濟建設，尤其是農業建設，「大半集中在試驗場，與研究室而未深入民間。」¹⁵¹專家們建議：「在民團訓練中加重識字訓練及公民訓練。其已受過訓練的民團應於其複訓時再行補習」，¹⁵²加強教育，彌補民團訓練之不足。

然而，國民基礎教育在參與廣西基層四大建設過程中，主要問題不是二者結合得是否緊密，而是結合中教育自身的受損和虧空。

廣西國民基礎教育數量已成，質量欠佳，這是時人的普遍看法。對此，教育部官員屢有議論：「唯當時求成過速，地方財力有時窮於應付，難免草率從事……今其量雖已達到規定，其質則未符合設校之標準。」¹⁵³究其原因，一方面制約於廣西當局重量輕質、急於求成的建設指導思想。在這種政策製導下，「先求量的普及而後謀質的提高，此不僅教育方面為然，其他各部門建設亦有同樣的情形」。¹⁵⁴另一方面，教育過多參與四大建設，為人作嫁，虧空自我。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廣西國民基礎教育，「為了政教合一的關係，幫助了政治，而犧牲了自己的質」。¹⁵⁵

最能說明國民基礎教育質與量問題的，或許是「三位一體」制度。在這種制度下，邨街長要兼國民基礎學校的校長或教職員，鄉鎮長要兼中心學校的校長或教職員，推行教育，強令執行。於是，國民基礎學校「便很普遍的設立」。¹⁵⁶亢真化也說，「因為三位一體制的實施，廣西的教育，獲得了飛

¹⁵⁰ 中國社會教育社廣西考察團編，《廣西的教育及其經濟》，頁45。

¹⁵¹ 童潤之，〈對廣西教育的一個建議〉，《建設研究》，卷1期4，頁7。

¹⁵² 中國社會教育社廣西考察團編，《廣西的教育及其經濟》，頁46。

¹⁵³ 周輝鶴，《廣西國民教育視察報告》（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卷5號10856。

¹⁵⁴ 邱昌渭，〈七年來的廣西教育〉，《廣西之建設》（二），頁455。

¹⁵⁵ 童潤之，〈國民中學與廣西建設〉，《廣西教育研究》，卷3期5，頁44。

¹⁵⁶ 莫達義，〈廣西的民團〉，《廣西之建設》（一），頁210。

躍的發展」。¹⁵⁷在行政權力的強制下，國民基礎教育的量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三位一體」制對國民基礎教育質的提高，並無多少好處。

1934年9月，應雷沛鴻之邀來桂講學的陳禮江指出，校長身兼數職，精力分散，社會進步，教育行政分散化均須專人負責，而民團隊長在幹訓大隊受訓時，「所受教育不過中小學程度」，受訓時間又短，祇六個月。¹⁵⁸也就是說，校長事太多，不能專心教育；教師水平太低，無力任教。這種情況到40年代也無多大改變。1941年，黃旭初也不得不承認，三位一體制實行以來，「一般意見認為鄉鎮長事情太多，精神不能專一，而且鄉鎮長多數沒有受過師範教育，對於學校行政經驗，尚多不能滿足社會一般人的期望，亦屬無可諱言。」¹⁵⁹

更有甚者，鄉邨長任意傾使教師或挪用教育經費。對前者，雷沛鴻十分不滿：「學校無專人負行政之責，致失去重心，教員復忙於教學以外之事務，遂造成『有名無實』之景象」；「鄉邨長每多任意指派教師辦理政務，荒廢教課」；「鄉邨長之調動頻繁，隨之教師之調動亦多」。¹⁶⁰如果說雷沛鴻的不滿在於教師時間被任意擠佔，盧顯能（生卒年不詳）的意見，則針對鄉邨長對教育經費的挪用。為此，盧氏建議：「為避免學校經費的被移挪流用起見，學校預算，則以單獨編列為佳」。¹⁶¹校長無暇校務，教師水平過低，且被驅使政務，經費又遭挪用，勢必對國民基礎教育質量產生影響。1940年9月，經雷沛鴻等人力爭，廣西當局決定了補救的政策，在「三位一體」制中設置專任校長。這是對三位一體制不足的重要修正，¹⁶²但在實際操作中，仍

¹⁵⁷ 亢真化，〈廣西鄉邨之三位一體制之檢討〉，《廣西之建設》（一），頁341。

¹⁵⁸ 陳禮江，〈廣西的民團及其評價〉，《申報月刊》，卷3號9，頁47。

¹⁵⁹ 梁上燕，〈論三位一體制的演進與政教分長〉，《建設研究》，卷6期3（民國31年11月15日），頁64。

¹⁶⁰ 雷賓南，〈廣西省三位一體制度運用問題〉，《教育通訊》（重慶），卷3期45，頁11。

¹⁶¹ 盧顯能，〈國民基礎學校的經費問題〉（桂林：民國週刊社，1940年），頁18。

¹⁶² 《廣西國民基礎學校辦理通則》（第2次修正），《國民教育法令彙編》（廣西省政府教育廳，1943年10月），章1。

有不少困難。1941年，教育部視察員陳達(1892-1975)在考察廣西教育後認為，「廣西國民教育因得力於政治力之推動，量上已達到水準」，但「在質上則較他省稍差」，¹⁶³可謂對廣西國民基礎教育的總體評價。對此，朱滋源先生也有類似看法：廣西教育的成效，「在數量上極為顯著，為全國上下所注目。由於……黨化與武化的教學方法，使教育的純度受到影響。」朱先生還對其原因作了分析：「廣西當年的教育仍是成功的，因為當年社會的需求重點，與和平的時節不同，在內憂外患均未除的階段，自保纔是最重要的課題」。¹⁶⁴筆者大體認同這一看法。進而言之，在文化教育比較落後的廣西，在不到十年時間，能使教育在數量上有長足的進步。從理論上說，數量與質量的關係是辯證的，質是建立在量的基礎上，沒有一定的量，質也無從談起。所謂教育的質與量，站在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精英教育與平民教育的不同立場，看法迥異，實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教育觀念之爭，眾說紛紜，難分優劣，關鍵要看當時的出發點和具體情況。揆諸雷沛鴻當年的本旨，以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相結合，改革單一的學校教育，在這種理念下的國民基礎教育，量可質欠，自然難以避免。

通過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對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基層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四大建設的整體和部分內在關係的探索可知，國民基礎教育不僅是廣西「模範」建設的成績，而且是廣西基層建設取得成效的媒介和動力。就教育與社會建設論，國民基礎教育對廣西基層建設的正面作用，表明教育在特定時空下，確可發揮異於平時的功能；而其負面影響，則是教育短期行為與長遠利益衝突的結果。如何在充分發揮教育參與社會作用的同時，又能保持其自身的規律和獨立精神，調適魚與熊掌的矛盾，仍是人們需要繼續努力求解的難題。

¹⁶³ 《大公報》（桂林版），1941年11月1日(3)。

¹⁶⁴ 朱滋源，《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1860-1937》，頁554-555。

徵引書目

一、檔案、年鑒、統計資料、資料彙編

1. 《廣西國民基礎學校辦理通則》(第2次修正),《國民教育法令彙編》,廣西省政府教育廳,1943年10月。
2. 《廣西國民基礎學校辦理通則》,廣西省政府教育廳編印,無出版時間。
3. 《縣政須知》,廣西省政府民政廳印行,民國23年3月。
4. 李彥福等編,《廣西教育史料》,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教育檔,全宗號卷5號10856。
6. 章之汶,《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二十四年度生產教育實施計劃草案》,桂林圖書館藏。
7. 廣西省十年建設編纂委員會,《桂政紀實·文》,民國29年。
8. 廣西省政府教育廳導學室編,《國民基礎學校各科教學法》,廣西省政府教育廳導學室印,民國26年7月。
9. 廣西省政府編,《廣西省改良風俗規則》,民國23年。
10. 廣西省政府編輯室編,《民國二十三年度廣西省政府施政紀錄·教育》,廣西省政府印行,民國25年6月20日。
11. 廣西省邕寧縣表證中心國民基礎學校編輯股編,《廣西省邕寧縣表證中心國民基礎學校校刊》,南寧:大成印書館,民國25年3月。
12. 廣西教育廳編,《民國二十四年度廣西省教育調查統計總報告》,廣西教育廳印,民國27年1月。

二、文集

1. 《陶行知全集》,卷4,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2. 亢真化、梁上燕合著,《改良風俗的實施》,民團週刊社,民國27年6月20日初版。
3. 亢真化編,《黃旭初先生之廣西建設論》,南寧:建設書店,民國27

年 9 月。

4. 白崇禧，《國防與教育》，桂林：全面戰週刊社，1930 年。
5. 宋恩榮主編，《晏陽初全集》，卷 1，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年。
6. 李宗仁等著，《廣西之建設》（合訂本），桂林：建設書店，民國 28 年 10 月 10 日。
7. 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上冊，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89 年。
8. 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下冊，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9. 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續編，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3 年。
10. 張家成，《國民基礎教育實施法》，《廣西縣政公務員政治訓練班講義》，未注出版時間。
11. 梁上燕，《廣西建設》，廣西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民國 31 年 3 月 20 日。
12. 陳俠、傅啓群編，《傅葆琛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年。
13. 黃旭初，《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建設》，廣西省政府編譯委員會，民國 29 年 2 月。
14. 黃旭初，《縣政建設與基層建設》，桂林：建設書店，民國 30 年 8 月 1 日。
15. 葉志平，《保衛大西南運動下新姿態之廣西》，邵陽青年圖書館，1940 年。
16. 雷沛鴻，《國民中學教育論叢》，輯 1，南寧：圖書供應社，民國 37 年。
17. 雷沛鴻編述，《本省教育方針講演綱要》之五，《廣西青年軍幹部講習班講義》，未注出版時間。

18. 雷殷，《地方自治》，1939年。
19. 潘景佳，《怎樣舉行邨街民大會》，民團週刊社，民國27年5月13日。
20. 盧顯能，《國民基礎學校的經費問題》，桂林：民國週刊社，1940年。
21. 盧顯能等編，《國民基礎教育實施法》，廣西省政府教育廳編審室，民國29年。
22. 賴於彥主編，《廣西一覽·民團》，廣西印刷廠，1936年。

三、回憶錄、遊記

1. 《廣西印像記》，輯1，未注出版者，民國24年3月。
2. 中國社會教育社廣西考察團編，《廣西的教育及其經濟》，無錫：民生書局，民國26年3月。
3.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
4. 曹聚仁著、曹雷編，《聽濤室人物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謝國楨，《瓜蒂庵文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
6. 龔家瑋主編，《廣西新教育之觀感》，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印，民國25年6月。

四、專書

1. 朱滋源，《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1860-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
2. 韋善美、程剛，《雷沛鴻教育思想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年。
3. 郭道明主編，《雷沛鴻國民教育概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4. 雷堅，《雷沛鴻傳》，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5. 鍾文典主編，《20世紀30年代的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6. 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7. Eugene W. Levich, *The Kwangsi Way in Kuomintang China, 1931-1939*,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3.

五、論文

1. 朱浚源，〈救亡兼啓蒙的良方：雷沛鴻訓政式普及教育改革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9，民國 87 年 6 月。
2. 朱浚源，〈評《國民黨統治下的廣西模式，一九三一～一九三九》〉，《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輯 21，台灣：國史館，民國 87 年 12 月。
3. 李德韓，〈論雷沛鴻教育思想及其實踐〉，《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期 3，1991 年。
4. 楊啓秋，〈三十年代廣西的國民基礎教育運動〉，廣西雷沛鴻教育思想研究會編，《雷沛鴻教育思想研究文集》（一），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2 年。

六、報紙、期刊

1. 《上海新聞報》，上海，1935 年 8 月 15 日。
2. 《大公報》，桂林，1941 年 11 月 1 日。
3. 《中華教育界》，上海，卷 22 期 2，1934 年 8 月。
4. 《民團期刊》，梧州，期 1，1934 年 6 月。
5. 《申報月刊》，上海，卷 3 期 9，1934 年 9 月。
6. 《抗戰時代》，桂林，卷 4 期 4，1941 年 11 月。
7. 《南寧民國日報》，南寧，1935 年 3 月 26 日。
8. 《建設研究》，桂林，卷 6 期 3，1942 年 11 月。
9. 《建設幹部》旬刊，桂林，期 7，1940 年 6 月。
10. 《國民基礎教育叢訊》，南寧，號 12，1936 年 1 月。
11. 《教育與民衆》，桂林，卷 9 期 2，1939 年 5 月。

12. 《教育通訊》，重慶，卷 3 期 45，1940 年 11 月。
13. 《教育週報》，南寧，卷 3 期 2，1934 年 3 月。
14. 《教育雜誌》，上海，卷 26 號 9，1936 年 9 月。
15. 《創進月刊》，卷 2 期 4，1935 年。
16. 《群言》，廣州，卷 11 期 2，1934 年 3 月。
17. 《廣西省政府公報》，南寧，期 121，1936 年 5 月 17 日。
18. 《廣西教育研究》，桂林，卷 1 期 5，1941 年。
19. 《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日刊》，南寧，期 1-500，1934-1936 年。